



大清郵政與海關分家背後的不為人知 —— 帛黎和安格聯的辛亥之爭

蔡維屏

在1911年的6月，大清郵政總局總辦帛黎 (Théophile Piry, 1851-1918) 給退居於倫敦的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寫了兩封信。除了提到北京政局的大致發展以外，帛黎向赫德大倒苦水，抱怨安格聯 (Francis A. Aglen, 1869-1932)，希望赫德能夠介入。在7月，帛黎又給赫德寫信，直接點名安格聯不可理喻，嚴重傷害郵政的利益。為何帛黎要給遠在倫敦的赫德替他主持公道？又為何掌海關和郵政這兩大組織的領導人在人前一團和氣，在人後卻劍拔弩張，爭鋒相對呢？這段不為人知的故事點出了郵政，海關以及晚清最後一年的紛擾糾葛。

In June 1911, Théophile Piry, the Postmaster General of the Great Qing Imperial Post Office, wrote two letters to Sir Robert Hart, who was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was on leave in London at the time. In the letters, apart from briefly updating Chinese current affairs, Piry complained about Francis Aglen, who was the Acting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Customs Service, and sought Hart's involvement. In July of the same year, Piry wrote to Hart again, and this time he harshly criticised Aglen for unreasonable behaviour both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and for seriously hur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ost Office.

The Post Office formally left the control the Customs Service at the end of May 1911, so indeed that summer was a critical time for this organisation. While both directors general presented a harmonious face to the public on the issue of the separation, they were bickering with each other private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unknown story of the failing 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leaders, set against institutional conflict and unsettl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what was to be the final months of the Qing Empire.

一、前言

在1911年的6月，大清郵政總局總辦帛黎（Théophile Piry, 1851-1918）給退居於倫敦的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寫了兩封信。除了提到北京政局的大致發展以外，帛黎向赫德大倒苦水，抱怨安格聯（Francis A. Aglen, 1869-1932），希望赫德能夠介入。在7月，帛黎又給赫德寫信，直接點名安格聯不可理喻，嚴重傷害郵政的利益。為何帛黎要給遠在倫敦的赫德替他主持公道？又為何掌海關和郵政這兩大組織的領導人在人前一團和氣，在人後卻劍拔弩張，爭鋒相對呢？這段不為人知的故事點出了郵政，海關以及晚清最後一年的紛擾糾葛。

二、郵政脫離海關的羽翼

在說明郵政脫離海關的背景以及帛黎和安格聯的爭執之前，有必要先描述一下海關和郵政當時的處境。庚子拳亂結束之後，慈禧太后因應外國勢力的要求，答應再次整頓內政，進行另一波的改革。對於這位歷經兩次逃難以及自強運動的女人來說，慈禧太后對時局的適應力應該是比外人所想像的還要來得堅韌。新政在1906年正式啟動，外務部（總理衙門為其前身）和度支部（戶部為其前身）決定攜手成立稅務處來監督海關。把稅務處安插在外務部和海關之間的作用就是把海關的層級降低，企圖調整為之已久的總理衙門－海關的互動關係。在初始階段，這個調整的政治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而各方對稅務處的成立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國方面覺得這是‘少年中國’的崛起，認為把海關和總稅務司一職從外國人手中奪回來的時候指日可待。英國方面感到頗受威脅，覺得他們在海關的優勢即將改變，進而可能會影響中

國對外債的償還。而德國雖然在表面上宣稱保持中立，但這個‘中立’的姿態實質上是在暗助中國。（註1）

赫德早已認為由中國人管理海關是遲早的事，面對稅務處的成立，他只能夠盡人事、聽天命，儘量保持低調。更何況外務部與總稅務司的溝通形式依然照常，並無任何改變。鐵良和唐紹儀也要他‘一切如常’。

（註2）隨著稅務處的成立，郵政在名義上也跟海關而從屬稅務處。只是在同年的數月之後，郵傳部即成立，部置郵政司，以準備接管郵政。但實際上郵政司一直並沒有接管郵政，直到1911年的5月。（註3）當初郵傳部的成立的確是為了要接收鐵路，水運，電報和郵政。只是在百廢待舉的情況之下，郵政的接收被擺在其它的部門之後，成為非緊急項目。造成這樣的原因主要為三。第一，與其它交通項目相較之下，郵政的重要性和牽扯到的利益相對較小。第二，懂得郵政事務的中國人較少，尚需要加強培養人才。第三，因為在接收其它部門之後，已經造成財政上的緊張，此時的郵政又是個賠錢的事業，因此與其立即接收，還不如讓海關繼續承攬責任。（註4）到了宣統二年和三年期間，在徐世昌、唐紹儀和盛宣懷等人的推波助瀾之下，實質上接收郵政的時間表總算浮現。郵政在宣統三年第五個月的首日（即1911年5月30日）正式離開海關。帛黎在毫不意外的情況之下被任命為‘郵政總局總辦（Postmaster General）’，答覆郵政總局局長，李經方。（註5）

就在這一天，代理海關總稅務司的安格聯發佈總稅務司通令第1802號，傳達郵政正式脫離海關的消息。這份通令簡短地說明郵政是如何在海關的呵護之下緩緩成長，遂成

為服務中國人民的一個重要機構。安格聯在最後還文情並茂地以赫德之名，向海關全體同仁致上謝意。他說不論是在過去或現在，因為有這些同仁不辭辛勞，不計回報的付出，郵政才能獲得現今的發展。安格聯也祝福今後的郵政宏圖大展，並且相信這兩個組織往后還是在最親密與和諧的關係下繼續合作下去。（註6）

隔日，也就是5月31日，帛黎也發佈一份洋洋灑灑的郵政總局總辦通令（簡稱郵政通令）。這份為第262號的郵政通令對全體郵政同仁說明這個劃時代的進展。帛黎一方面要員工們理解，這個制度上的分家並不會影響正常的作業以及員工的薪資福利等等；另一方面也告訴員工這個改變是中國制度國家

化的自然進程中的結果：郵政如今在政府結構中也終於有了一席之地。他相信，今後郵政在國家完全的贊助之下，不但會展開新的一頁，而且會成為世界上偉大的郵政之一。文末，帛黎也不忘感性地向海關員工致意，並且提及遠在他方的赫德。他認為郵政堪稱為赫德最嘔心瀝血的傑作（*magnum opus*），帛黎並致力要使這創作臻於至善。（註7）（見圖1-3）

這兩份通令皆描述海關和郵政彼此濃厚的情誼和剪不斷的共同奮鬥歷程，但在這場不捨與相互祝福的告別場面的幕後，這兩位領導人卻為了兩件事情有了嚴重的爭執。第一件是郵政款項被安格聯扣住不放，第二件是安格聯不同意帛黎索討的福利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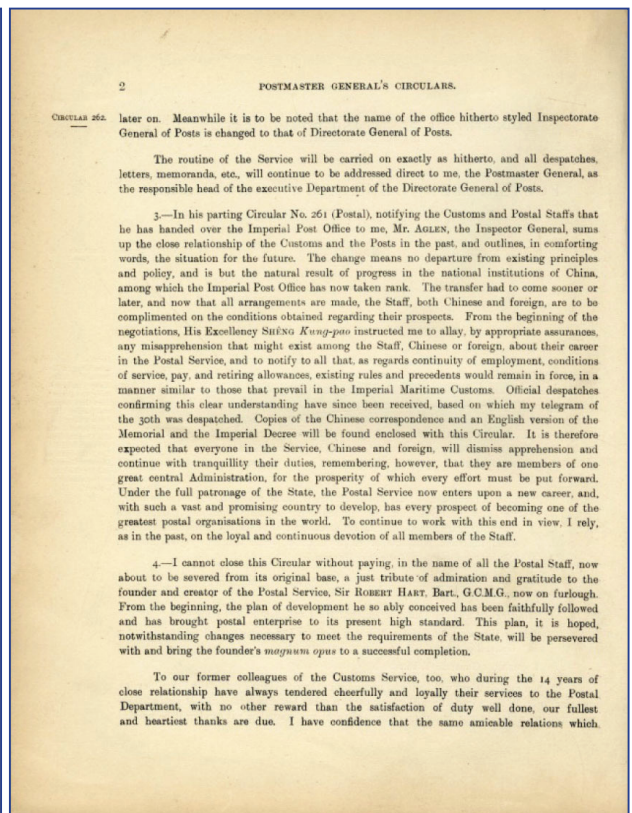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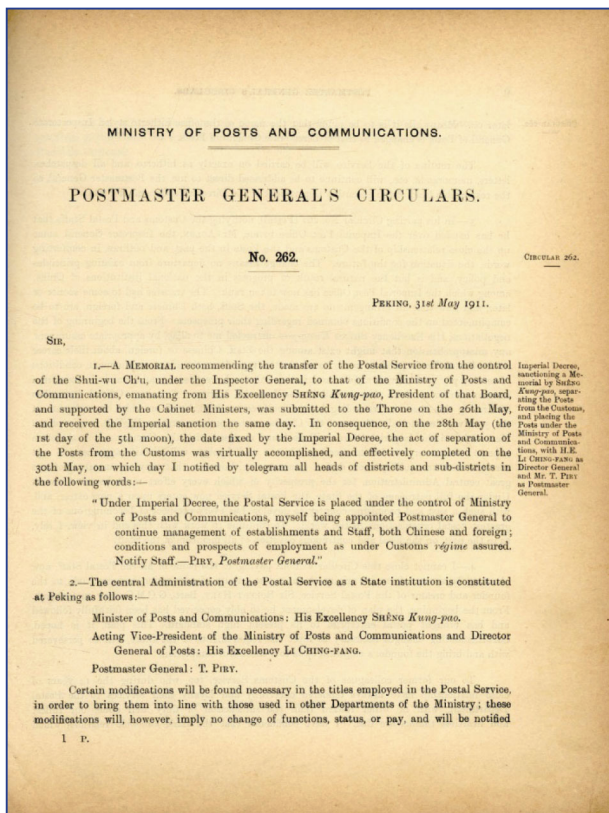


圖1、2：1911年5月31日發佈的郵政通令第262號

三、帛黎和安格聯的爭執

的確，就在海關與郵政分家的同時，帛黎和安格聯私底下的戰火似乎愈燒愈熱。帛黎為以上這兩件事情急火攻心，而安格聯也給予強烈的回擊。帛黎認為他在過去的四十一年中為海關和郵政盡心盡力，不僅有苦勞，更有功勞。在這個組織變動的過程中，首先帛黎得需從海關辭職，然後再被郵傳部聘為郵政總局總辦。在告別他服務這麼多年的機構的時刻，惜別之餘，帛黎也相當在意他新的頭銜和一份豐厚的告別津貼。他申述的理由是，從1911年往前推的十八年間，他只有一年的休假，而非正常該有的四年甚或五年的休假。並且，從1901年起，他就開始負起管理郵政的特別任務，但所領的

薪資卻無特別加給，更遑論他為海關羽翼下的郵政項目所立下的汗馬功勞。他還強調，此刻的他已經是六十出頭了，他在新的制度之下究竟還能做多少年呢？到時又能夠從新的體系裏拿到什麼樣的退休奉呢？天有不測之風雲，他隨時都有‘走’的一天，又怎能不替他的妻女著想呢？基於以上總總，加以援引前人的例子，他希望安格聯能夠投以同情，公平的做出裁決，積極回應他告別津貼的要求。（註8）

一開始帛黎要求津貼的細節包括沒有休假的四年的半薪（等於兩年的全薪）以及海關的退休年金應該延長計算到1915年。等不及安格聯的答覆，在隔日，帛黎又提筆，信中對要求的內容有所調整，並加上一個簡單的計算方式，得出一個43,500海關兩的結論。（註9）帛黎在6月4日又給安格聯發了第三封信，才終於讓安格聯給他答覆；只是這個答覆並非如帛黎所願。由安格聯的回信中可以得知，帛黎在4日的那封信上應該有告知安格聯，他在當日下午會和郵政總局局長李經方見面，並會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也許是不滿帛黎的口氣，或者不滿帛黎即將採取的行動，安格聯斷然拒絕帛黎的要求。他說：“我目前不打算長篇大論的說我拒絕的原因，但基於你下午就要和李侍郎見面，你又要有個答案，我想最好就是讓你立刻明確地知道[我的決定]。”（註10）他還繼續警告帛黎，他不應該讓這個答案來影響他往後所做出的決定，否則不但會傷害他自己也會傷害到郵政。

在這之後，兩人為此事又有數次書信來往，帛黎對安格聯軟硬兼施，而安格聯則反擊說於公於私他都無法答應。到了6月10日，安格聯告訴帛黎，他本來會很高興去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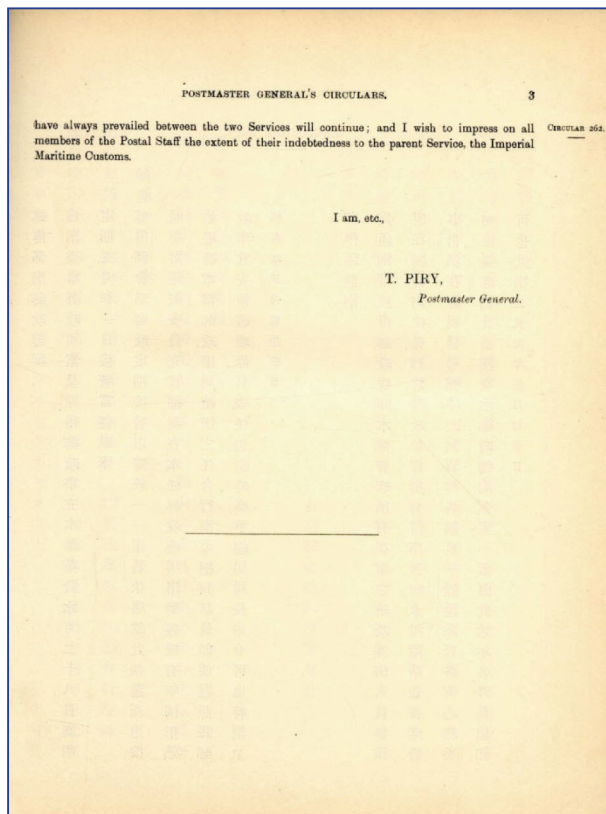


圖3：1911年5月31日發佈的郵政通令第262號

加為帛黎和郵政職員設下的惜別宴會，與他們共同舉杯。然而既然帛黎威脅了他兩次，他已經無法接受邀請出席，除非情況有所改變。（註11）在安格聯的眼中，帛黎把李經方牽扯進來就是等於在威脅他。最後這個歡送會居然落得被取消的下場，帛黎一狀告到赫德那裡。

赫德在1908年以休假的名義離開中國，總稅務司一職先由他的舅弟裴式楷（Robert Bredon, 1846-1918）署理，到了1910年的4月15日移交給安格聯代理。赫德原先是希望裴式楷能夠繼任他的職位，然而事與願違，最後由安格聯勝出。（註12）在他去世之前，他與這些人都保持書信和電報聯繫。當帛黎在6月13日寫信給赫德時，他也附上上述的那份郵政通令。他以一貫尊敬的口吻對赫德說，在那份通令上帛黎把他奉為郵政的創始人，公開地向他致上欽佩之意和感謝之情。他還說，在這個困難的時局中，他預見未來挑戰重重，而他會勇敢地逆風而行，鞠躬盡瘁。話鋒一轉，他把他與安格聯的爭執告訴赫德，並把他們的往來信件的副本也一併寄給赫德。他委屈地說，他沒料到他如此辛勞的職業生涯會落得如此不堪，竟然以這種方式被海關踢出去，只獲得比對待狗還好一點的待遇而已。（註13）他呼喚著，要赫德這位老長官出來撥亂反正，主持公道。

帛黎的部份個性在這裡似乎一覽無遺。和在海關裡的不少洋稅務司一樣，帛黎也是‘允文允武、才藝雙全’。這種具有多方才能的优点非常符合赫德的品味，也是他自由心證鑒賞稅務司人才的條件之一。帛黎除了喜歡攝影之外，也有些書寫創作。他在1874年加入海關，為‘四等幫辦，後班’，這是很多外國人加入海關內班時的入門等級。在

北京學習中文和海關事務的同時，他也在北京同文館擔任法語教習。（註14）這時候的同文館乃是附屬海關。他把《訓廣諭聖》翻譯成法文，並在1879由海關造冊處（即統計處）出版，這可算是海關和同文館的共同業績。他在1880年出版了一部法文小說：Erh-tou-mei, ou, Les pruniers merveilleux : roman chinois, 並給它取一個中文名‘二度梅’。他還著作《鉛槧匯存》，在1895年由海關造冊處出版。這是一本英法文皆備的漢語教學教材。

在收到帛黎的請求之後，赫德並沒有如帛黎所願，相反地，他還訓示了帛黎一頓。赫德認為是帛黎自己選擇不休假，況且1911年以前的郵政總辦（Postal Secretary）所支領的薪水比海關部門的職員還高。赫德也不認同帛黎提出所謂他被迫離開海關的說法，因為當郵傳部詢問他的意願時，他大可拒絕而留在海關。（註15）在安格聯不願意買賬，赫德不寄予同情，以及李經方也不願意積極介入的情況之下，（註16）在這一回合的爭執中，帛黎空手而歸。但在另外一個戰場，帛黎並非全盤皆輸。

四、郵政經費的爭執

就在帛黎為個人的利益與安格聯爭執的同時，他們兩人更為另一個更大的金額而齟齬。這個金額就是天津，漢口，上海，福州，汕頭和廣東等六關分攤的郵政經費。在協助滿清完成庚子賠款的談判之後，在清政府的眼中，赫德算是個有功之人。在庚子之亂之前，清政府就希望郵政路線擴張的速度能夠加快，但因為拳亂，只能暫緩。在社會秩序恢復之後，擴張郵政事業的腳步又加快了起來。在這個情況之下，赫德要求中央給

予金援。於是戶部同意從這六關的稅收，每月各撥款一萬海關兩，這樣每年郵政就會有七十二萬海關兩的資金。（註17）

雖然這六關撥協濟款的本質是海關稅收，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它們是由各關的海關監督經手，而非由各地的稅務司管理。在戶部的命令下，從1904年7月起，這六關的海關監督會每個月把款項撥給當地的海關稅務司，之後這些稅務司則必須把全額存放到位在上海或香港的總稅務司帳戶。（註18）海關從1861年以來就開始以試驗性質的方式在內部辦理郵政業務，在這期間也包括運送總理衙門和外國使館間的部份信函。對民眾開放的冬季郵政業務在1878年展開，大清郵政在1896年成立，在這幾十年間，郵政支出都是由海關自行吸收。所以這個六關的撥款有其重要的意義。

赫德對這個發展很高興，他在給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1833—1907，海關駐外稅務司）的信中掩蓋不住欣喜，把他內心的盤算說出來。他說，這樣郵政每年就至少有七十二萬兩的基本資金。此外，郵政本身有三十三萬兩的營運收入，所以就帳面上來看，郵政將會有超過一百萬兩的資金可以運用，足夠用來拓展郵路。但他打算把郵政開銷就限制在這七十二萬兩以內，然後把營運的收入上報為增加的年收入，‘這樣看起來較像是成功，讓出資的人開心。’

（註19）不過赫德沒能高興很久，因為他似乎很快地就聽到風聲，這六關的當地政府可能不會撥足款項。（註20）果然，這六關全未如數照辦。就以1904 - 1905年為例，總稅務司收到的總款項比預計的還要少十五萬三千兩；而戶部只好裁定這個差額就‘援照從前辦法暫由海關借墊。’（註21）這個六

關撥協濟款的短缺現象一直維持下去，每年短缺三十多萬兩以上幾乎已成常態。到宣統元年止，海關實墊銀為一百七十八萬餘兩。（註22）

當初在擬訂分家原則時，安格聯以代理總稅務司的身份向其直屬監督機構稅務處呈送一份所謂的‘交替郵政要義五條’，之後經由稅務處‘咨行郵傳部查照核辦’。

（註23）這份‘交替郵政要義五條’有其重要性，因為它列出海關與郵政分家的基本框架，並且被郵傳部所接受（見圖4-5）。其中的最後一條寫著：‘新關歷年撥墊以助郵政暫行浮用之經費應由大部承認歸還交由總稅務司查收俾得將新關緩辦各要事繼續舉辦。’（註24）對於海關為郵政的暫墊款項，將由郵傳部與度支部會商議‘如何分年陸續籌還’。（註25）

此外，郵政和海關兩造牽扯的帳戶與賬目必須在當季結算日，也就是的陽曆8月23日，前釐清完成。以上的這些背景就是鋪陳了帛黎和安格聯的第二個爭鬥。

在6月17日，帛黎寫信給安格聯，請他把今年度在分家之前的六關撥協濟款，即十一萬九千多海關兩，以支票的形式轉給他。（註26）帛黎認為這筆經費毫無疑問屬於郵政，但安格聯不持這個看法，認為若帛黎要這個款項的話，應該把它視為一筆向海關借貸的新項目，並且應該累計在海關陸續為郵政暫墊的賬目上。（註27）之後安格聯又向帛黎表示，海關願意先給郵政一筆七萬兩的貸款以讓他們應急。但帛黎拒絕這個提議，他不明白安格聯為何表現的和當初說好的不一樣，他也說安格聯沒有理由掐著款項不放，更何況中央也已經承諾要把海關為郵政的暫墊款項歸還。他除了再次強調這個款

項本來就是給郵政以外，還指出郵政若是沒有收到上季的六關撥協濟款，很有可能就會破產。另外，若是按照安格聯的提議來把這款項當作一項新的借款來看的話，帛黎說他自己也沒有權限來答應這項借款。（註28）

帛黎再次向赫德抱怨安格聯，說後者又再度不講道理。他猜測安格聯為了讓他自己的總稅務司位子坐熱、坐穩，不惜撒大筆金子來提高員工薪資和退休金，於是緊緊扣住每一分錢。帛黎害怕今年的帳簿會出現虧錢的結算，這讓他非常的難過。他還說雖然郵傳部已經要出面協調了，但前途未卜，到時候他也不惜拒絕在分家的帳本上簽字。（註29）

帛黎對安格聯的這個看法與裴式楷的觀察不謀而合。裴式楷在給赫德的信上也說安

格聯似乎在用錢來收買人心，給職員升等加薪。裴式楷說他不知道安格聯要如何來支付這些開銷，但他也聽說安格聯將會回收一筆為數近兩百萬兩的郵政預付款項（postal advance）。（註30）這裡指涉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海關歷年以來所代墊的郵政支出。

在同一封信中，裴式楷對帛黎也做了一個有趣的描述。他說帛黎對於郵傳部接收郵政喜形於色，甚至表現得像小孩子一樣。帛黎認為他向郵傳部所提出來的要求都獲得了滿足，從此以後他也可以和安格聯平起平坐。帛黎開始署名自己為‘Postmaster General’，似乎頗有與總稅務司‘Inspector General’較勁的意味。

雖然目前尚無法清楚地知道郵傳部協調的細節以及這筆為數十一萬九千多海關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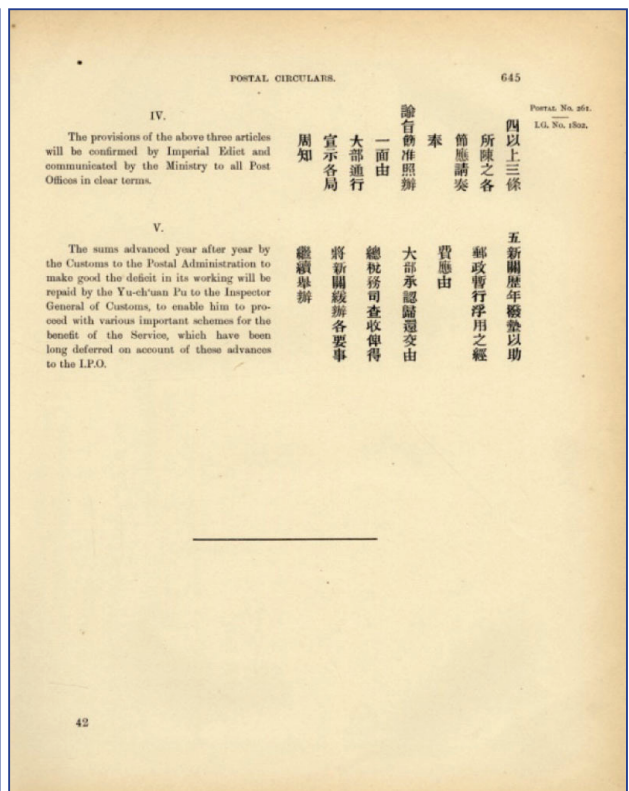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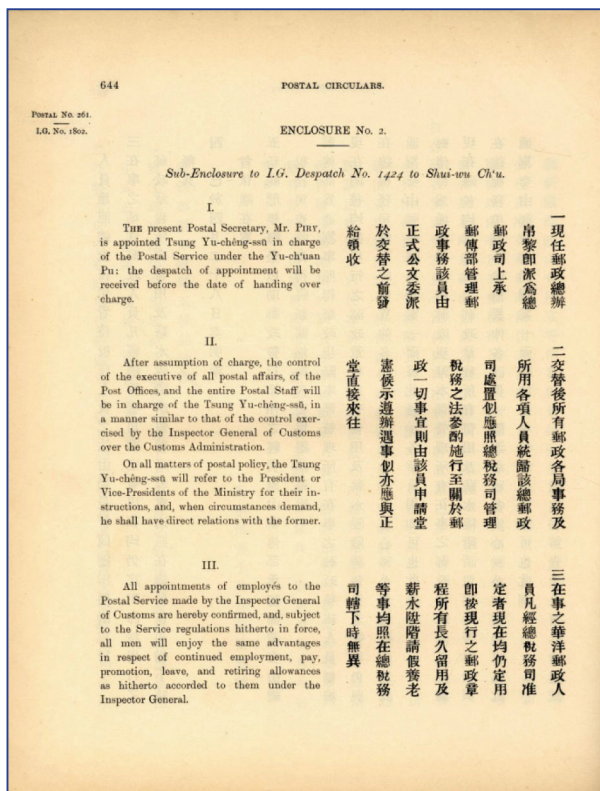


圖4、5：安格聯所擬的‘交替郵政要義五條’，此為總稅務司通令第1802號之附件

做出一道具有朔及既往的宣示性動作，它雖然沒有觸及那份十一萬九千多海關兩的撥協濟款，但也正式澄清度支部和郵傳部往後的立場。

至於海關陸續為郵政代墊的款項，在經過協商之後，確定的墊款總額為海關銀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多兩。在年息四厘的條件下，將分五年攤還。帛黎當初向赫德說他可能會拒絕簽字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在分家之後的郵政尚無法財政自主，仍然需要依賴協助。郵政一直要到1919年1月才開始按月還本付息，到1925年底才償還全額。（註33）

五、結論

相信帛黎和安格聯都沒有預見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後，辛亥革命發生以及滿清政府倒台。整個中央組織雖不至於完全重新洗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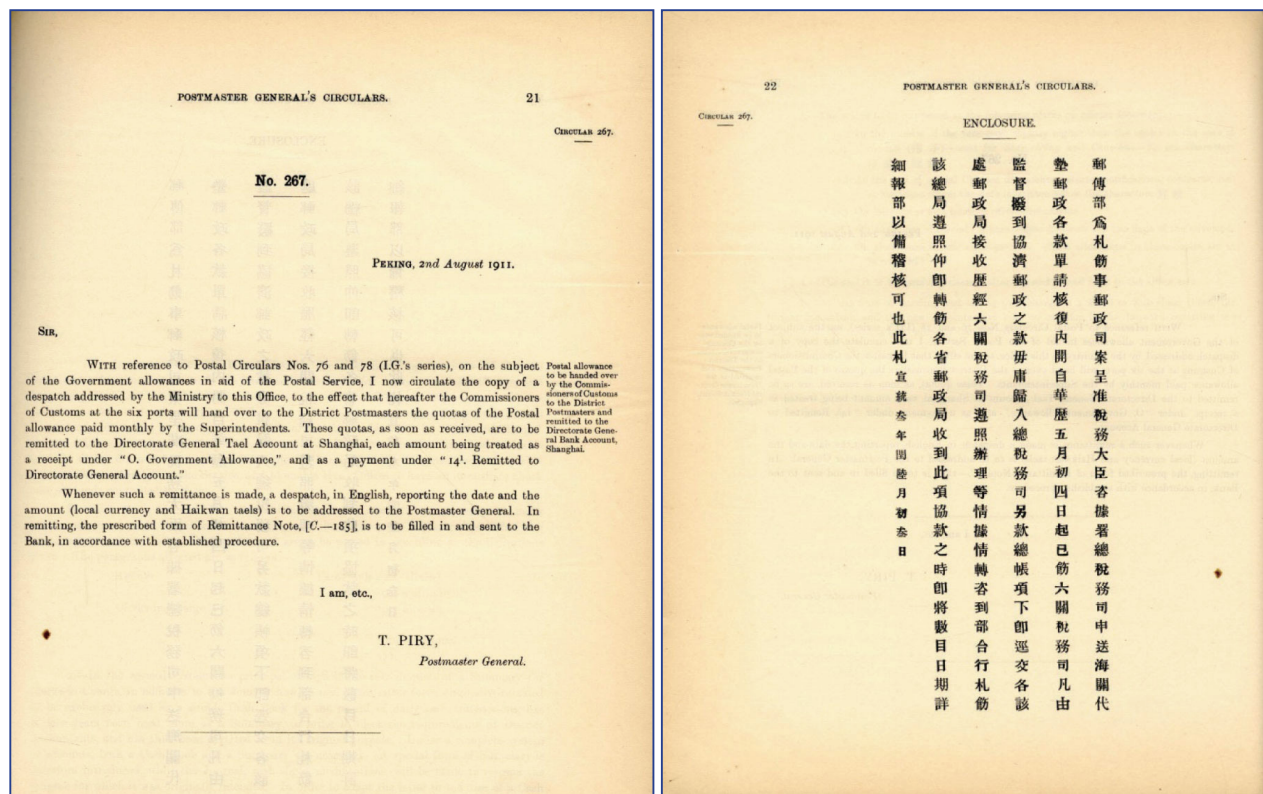


圖6、7：郵政通令第267號，1911年8月2日

但也經歷很多人事改變。李經方的郵政總局局長一職也在短時間內從梁士詒，換到袁長坤（代理），再換到王文蔚，交通總長的人事調動也發生頻頻。在政權交替的過程之中，如何讓郵政在變動最小的情況下繼續運轉就變得非常重要。帛黎在1912年2月向全體員工傳達國號已經改成‘中華民國’，袁世凱被授權來組成臨時政府。帛黎還保證郵政的利益不會受損，而郵票暫時也不會有任何的更動。若有人對此持有異議的話，就必須告訴他郵票的本質等同錢幣，具有現金的價值。在整個國體變動的情況下，如何保持郵政和他自身的利益成為帛黎新的課題。

民國成立之後，安格聯對袁世凱和北洋政府的重要性日益加深。主要的原因在於海關為內外債背書的份量愈來愈重。安格聯成為‘太上財政總長’。但儘管他對外的重要性和地位增加，他個人在海關內部受歡迎的程度卻在逐漸下降。當初他雖然想要藉由撒錢來換買人心，但並沒有給他帶來他預期的結果。主要的原因在於他的個性的拘謹以及他對員工長遠的福利和退休金採取相當固執的態度。

安格聯在1888年12月加入海關，當時19歲的他也是從‘四等幫辦，後班’開始做起。當他在1910年成為代理總稅務司時，他為41歲。據裴式楷的看法，安格聯其實在一開始是很受到帛黎的影響的。所以帛黎可能也沒有料到安格聯對於他的個人福利金和六關撥協濟款竟然會採取這麼強硬的態度。帛黎在1917年的6月申請退休，一年之後在法國去世。安格聯和帛黎在1911年5月的最後兩天所各發表的通令標識了近代中國兩大最重要的現代行政機構的重要歷程碑。在共同營造和諧和不捨氛圍的表面下，內部其實波

濤洶湧。對在遙遠一方的赫德來說，至少在他去世之時，唯一可以聊以慰藉的大概就是海關和郵政都還是屬於大清帝國。

註1：赫德致金登幹，1906年5月20日，載費正清等主編：《總稅務司在北京：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致金登幹書簡(1868-1907)》(The I.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 - 1907)，麻塞諸塞州，劍橋：哈佛大學貝爾納普出版社，1975年，第2冊，第1508頁。

註2：同上。

註3：晏星（潘安生）著：《中華郵政發展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94年，第382頁。

註4：蘇全有：《清末郵傳部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326-329頁。

註5：“郵政通令第265號”(Postmaster General's Circular)，1911年6月28日。

註6：“總稅務司通令第1802號”(Inspector General Circular)，1911年5月30日，載於魏爾特：《中國海關的起源、發展及其使用中的檔案彙編》(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上海：總稅務司署統計科，1938年，第3卷，第16-17頁。

註7：“郵政通令第262號”，1911年5月31日。

註8：帛黎致安格聯，1911年6月1日，英國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檔案，MS15. 2. 14a.

註9：帛黎致安格聯，1911年6月2日，同上。

註10：安格聯致帛黎，1911年6月4日，同上。

註11：安格聯致帛黎，1911年6月10日，同上。

註12：關於赫德繼任的問題，劍橋大學方德萬在2014年出版的海關歷史一書有非常生動的敘述，見Hans van de Ven, *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此書已由蔡維屏等翻譯為中文，並將在2017年8月由北京漢唐陽光出版社出版。中文版書名為《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

註13：帛黎致赫德，1911年6月13日。

註14：帛黎的職涯簡介見於載於魏爾特：《中國海關的起源、發展及其使用中的檔案彙編》，第2卷，第676頁。以及帛黎致安格聯，1911年6月8日，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檔案，同上。

註15：赫德致帛黎，1911年6月28日。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檔案，同上。

註16：帛黎致赫德，1911年6月23日。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檔案，同上。

註17：“總稅務司通令第1164號/郵政通令76號”1904年6月16日，載於魏爾特：《中國海關的起源、發展及其使用中的檔案彙編》，第2卷，第421頁。

註17a：“郵政通令第262號”，1911年5月31日。

註18：“總稅務司通令第1169號”，1904年7月18日，載於魏爾特：《中國海關的起源、發展及其使用中的檔案彙編》，第2卷，第426頁。

註19：赫德致金登幹，1904年6月12日，載費正清等主編：《總稅務司在北京》，第2冊，第1416頁。

註20：赫德致金登幹，1904年7月18日，同上，第1423頁。

註21：“摘錄節略內論郵政經費各關未能如數協濟一款”，為“總稅務司通令第1244號”之附件，1905年4月29日，載於魏爾特：《中國海關的起源、發展及其使用中的檔案彙編》，第2卷，第467頁。

註22：同上。

註23：“稅務處代行代理總稅務司”，為附件於“總稅務司通令第1802號”，1911年5月30日，載於魏爾特：《中國海關的起源、發展及其使用中的檔案彙編》，第3卷，第23-24頁。

註24：總稅務司申復稅務處附錄五條中英文版，為附件於“總稅務司通令第1802號”，1911年5月30日。

註25：“照錄郵傳部原奏”，為附件於“總稅務司通令第1802號”，1911年5月30日，載於魏爾特：《中國海關的起源、發展及其使用中的檔案彙編》，同上，第21頁。

註26：帛黎致安格聯，1911年6月17日，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檔案，同上。

註27：安格致給帛黎，1911年6月20日，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檔案，同上。

註28：帛黎致安格聯，1911年7月5日，同上。

註29：帛黎致赫德，1911年7月11日，同上。

註30：裴式楷致赫德，1911年6月4日，同上。

註31：“郵政通令第267號”，1911年8月2日。

註32：郵傳部飭郵政總局總辦，附件於“郵政通令第267號”，同上。

註33：《郵政大事記》，交通部郵政總局編印。臺北：民國五十五年三月，第一集上冊，第88頁。